

# 后危机时代，市场经济向何处去？

李稻葵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走势，可以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英国和美国。未来十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向左转”。第二个板块是欧洲大陆。他们的经济体制将“向右转”，进一步放开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及亚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其次，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地放权，应该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宛如坠落于水中的巨石，激起了全球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的层层波澜。金融危机爆发六年来，发达国家经济体远没有走出阴影；新兴市场国家仍承受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痛苦；中国经济在减速。在这个大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初次分配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重大话题之一。皮凯蒂在书中试图论证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其收入分配一定是对劳动者越来越不利的，因此政策必须大加干预。这种结论本身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大，全面考察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走势。

## 影响世界经济体制演变的第一大因素：全球化

笔者认为，考察未来全球各国市场经济走势有两个根本因素，这两大因素在现有的讨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第一个根本因素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波澜壮阔，它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了这一轮经济大格局变化的冲击力。全球化就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原本存在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壁垒，它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彻底打破了各国市场经济全球收入分配的大格局。皮凯蒂的书最大的局限是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因此其结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所作出

的。他没有看到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工总体上讲在全球范围内相对收入份额是上升的，中国的劳工阶层是重要的受益者。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非农部门所增加的劳工数量相当于整个发达经济体劳动者的总和。因此，不考虑中国，是无法得出任何有关全球劳动收入分配的可靠结论的。与此同时，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对全世界的资本（不光是中国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资本）是重大利好。全球化的第二个后果是那些经济效率低下的市场经济体得到了无情的惩罚。希腊、葡萄牙和法国等国家社会福利丰厚、国家干预主义盛行，此轮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业的波动影响到各国金融体系乃至传递到公共财政体系，本质上却是各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因整体经济效率低下所承受的惩罚。因此要考察未来世界经济向何处去和全球各国经济体制向何处去，必须考虑全球化这一进程的重大影响。

### 影响世界经济体制演变的第二大因素： 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

考察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的第二个根本因素，就是各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的不同。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制度禀赋包括三大变量，既包括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也包括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以及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各国在这三类禀赋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其经济体制演变的方向和演变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经济体制的社会禀赋，概括地说包括三大变量。第一大变量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也就是指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能力。举例说来，民众在一个波动的资本市场中的运作能力，不同地区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民众明显比内地民众更理性，他们更懂得如何应对一个波动的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即便是在中国内地，不同地区人群的市场理性度也是不一样的，江苏、浙江、福建等

沿海地区百姓的市场理性程度明显比内陆地区要强。当然，这一点是不断演进的，因为知识在传播，民众在学习。第二个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较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不同的社会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度上的选择是不同的。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社会更强调个人自由，而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也许对社会秩序更加强调。而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于美国，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民众更加注重秩序。当然，这里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广义上的理解，它不仅包括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还包括各种各样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中国民众偏好是不一样的。

经济体制的第三个禀赋性的变量，就是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说，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力极强，比如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比较高效地贯彻执行一套经济体制；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政府对民众负责程度的提高，这一变量也会改变。同时，不同地区的政府能力也是不同的。

###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维度

现代市场经济纷繁复杂，如何高度地总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处呢？综合已有的文献，我认为可以总结出三个基本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有关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也许是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在此有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日本式的所有权高度社会化控制的模式、美国式的大股东通过资本市场操控的模式、欧洲大陆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干预的混合式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往往被狭义理解为产权安排）往往是内生性的，是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所推行出来的。以日本为例，由于遗产税极高，家族很难持有企业；以德国为例，由于资本运作往往受限，家族比较容易地长期稳定控制企业。有关交易的制度安排，不同经济体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极端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由价格决定的自由交易市场的制度安排。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会有连续的、无穷的选择。限购或者限价就是比较接近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另一个案例是，一般情况下，汽车市场被认为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的交易，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试想一个消费者想从国外直接进口一辆稍微特殊一点的车型（比如手动档的豪华奔驰轿车），这种交易往往不见得能如愿，因为政府在汽车产品的环保、安全等方面是有标准的，进口一个车型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审批程序。

第二个基本维度是维系市场经济平稳运作的制度安排。必须承认，现代经济具有内生的基本的波动性，这种波动往往是巨大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为了应对内生的波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必须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公共品的厘清与提供。必须认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要由国家来提供。

在这方面，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至今为止，英国与日本显然认为一些基本的新闻和媒体服务是公共品，因此，英国广播公司（BBC）与日本的NHK都是国家出资，政府监管；美国则没有这一传统。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务在新加坡被理解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国则更多地被理解为私人产品。是否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否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减少收入差距，从而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和谐度？不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千差万别。福利制度同样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是上世纪初英国

首先提出、在德国得到大力推进的。一个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维系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公共财政也是维系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性制度，这里又有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来自于国有企业还是来自于税收，国家要不要控制一部分赢利性资产，要不要控制一些非生产性的金融资产。此外，宏观经济的管理体制，比如央行、证监会、银监会等方面的管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即便最保守的自由意志者也承认。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反复强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央行有天然的职责，必须大量印钞；而且，央行需要与财政部协调，而非孑然独立。再有，维系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监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对相关的金融机构是否要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监管，对它们的资本量、风险程度是否要不断监控，甚至是征收惩罚性的税收等。

第三个基本维度是利益冲突的解决和权利分配的机制。经济中的各个利益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友好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即便科斯（Ronald Coase）也认为，要维系市场运行，必须要有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庭做背景。权利分配与此密切相关，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决定着交易双方如何进行协商，这也是科斯反复强调的。事实上，科斯定理的要点就是强调权利分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把权利划分清楚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公正的第三方合同执行者，市场双方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商谈判，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强调法制的作用。法制在中国有一种被神化的趋势，认为法制是万能的。这值得仔细研究。法制本身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在现实中，两类群体是法制的占优者。一是市场上的强势群体或者说有财富的阶层，他们往往在法律上是占优的，因为他们可以雇佣最优秀的律师以及利用相关资源打赢官司。二是政府，他们往往是法律体制上的强者，普通民众很难

告赢政府。所以，法制的正常运行必须要有一套相关的体系来维系，尤其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监管来维系，比如通过政府的监管来约束社会上高财富阶层影响法制的强大能力；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公众媒体等公开的方式，以及政府分权的方式，来约束政府在法制体系里天然的优势。

法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谁来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英美体制下，立法权很大程度上是下放给法院和法官的；而在欧洲大陆，立法的权力是由政府部门代表国家来实现的；中国目前的立法也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的。这种政府主导的立法的缺陷，我们已经看到过不少。

### 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趋势：英美和欧洲

根据以上两个根本因素的分析，即，全球化和各国市场经济的制度禀赋，我们可以分析预判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走势。这里可以基本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英国和美国。英美在全球化进程中总体上是受益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具有高科技、金融以及现代服务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媒体行业的巨大优势，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两国的经济总体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却发生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国内社会阶层的大分化：那些处于低端的、没有技能的、不能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大量劳工阶层，被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取代，本国的资本流向了新兴市场国家，本国的低技能劳工阶层失去了工作。此轮金融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十几年前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克林顿政



美联储疯狂印钞 黄金或成投资宠儿

府意识到了社会经济利益分裂的加剧，因此在住房和金融问题上试图帮助本国的低收入家庭，过份地、隐含地补贴了本国的房地产行业 and 房屋贷款部门，带来了资产的泡沫和房地产危机，这被印裔经济学家印度、现任银行行长拉詹称为社会断裂层。

因此对于英美而言，未来十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向左转”。下一届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首相在未来最有可能采取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加强社会基本福利的提供，包括教育的公平性以及贫困劳工阶层的技能培训，将会强调政府和再分配的作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国家，金融界和高科技行业面临着被加税的前景。

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个板块是欧洲大陆。欧洲大陆，除了德国之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劣势。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过份优厚，因此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和国债居高不下。从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来看，整体上讲他们的经济体制将“向右转”，那就是，进一步放开市场的作用，适当

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当下法国总统奥朗德采取了一套左派的经济措施，目前在社会上带来了一片怨言。尽管皮凯蒂根植于法国，而他的书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似乎将引导社会政策向左转；但我估计，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下，法国市场的最后发展结果是向右转，下一任法国总统很可能来自于右翼。

### 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大方向

中国的情况相对于以上这两个版块的国家偏于复杂，那就是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旧体制的痼疾仍然没有消除。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我们必须先厘清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在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方面，中国的社会禀赋仍然处于演进的过程中，普遍说来，中国民众不如长期市场经济经历的发达国家的民众理性度高。而在对秩序以及个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国民众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应该说比美国等国民众更加偏向于社会秩序。同时，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也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在高考方面执行力度比较强，腐败比较少，其他方面远非如此。给定这些社会禀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地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和中国更接近一点，因此需要仔细研究。

其次，一个应该没有太大争议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地放权，应该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土地所有权问题，

江浙一带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不妨先行一步。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符合实际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律可以执行，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

第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百姓的社会禀赋是在不断演进的，市场理性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也是不断改变的，政府的执行力也是会不断改变的——改革本身就在不断推动政府的执行力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因此，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今天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改革的方向，从而以一个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一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这样也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可选择的余地，而企业的选择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积极性与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项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分配方面的作用，提升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缓解市场经济的一些自发的宏观波动；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政府将减少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有意思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以来，这两方面改革的步伐似乎略有不同。到目前为止，提升社会公平、公正、转变政府职能、约束市场经济破坏性的一些改革进展得比较顺利；而在微观层面搞活市场经济的策略由于种种原因相对滞后。因此，可以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微观层面搞活市场经济的改革将会逐步跟上。因此，不能基于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市场经济改革方面的进展而简单得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向左转的结论。中国的问题远比西方更为复杂，中国改革的目标也更加宏伟，因此必须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